

◎创作谈

理想浇灌希望之花

徐贵祥

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2019年暑假回故乡，照例要到大别山转转。但这次不一样，又往大山深处走了一程。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汤汇镇的一个山坳里，看到一所老式建筑，土墙黛瓦，“六区一乡列宁小学校”的牌匾虽历经风霜，上面的字迹仍依稀可辨。这是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最早的列宁小学。走进大门，认真打量那些铺满时光印痕的砖瓦和无语的门窗，侧耳细听，仿佛听到琅琅读书声，从遥远的天穹、从几十年前的山谷、从洒满阳光的枝叶上泉水般涌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下山的路上，我有点神情恍惚。朋友跟我讲，中国最早的希望小学——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也在这座山上，距离列宁小学只有20多公里。我心中一动，预感可能会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当时还很朦胧。问了朋友才知道，列宁小学始于1930年，希望小学始于1990年，中间跨度正好是60年。

那时，我正踌躇满志地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暂名《飘呀飘起来》。众所周知，大别山是一座革命山、英雄山，作为一个“正面强攻”军旅题材的作家，大别山已经成为我创作生命的摇篮，成为我英雄书写用之不竭的源泉。萌芽中的《飘呀飘起来》，自然还是以革命战争和英雄塑造为主题。

史料未及的是，这次参观列宁小学，改变了我创作方向。从山上下来，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鄂豫皖最早的列宁小学，同中国最早的希望小学，同在一个山坳里，这

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巧合还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然？列宁小学和希望小学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或认为当然有，而且是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血脉相连。有理想才有希望，如果说列宁小学寄托着前辈革命者对未来的理想，那么希望小学就是这理想浇灌的花朵。理想、希望，这两个词，就像两只扇动的翅膀，在下山的路上，一直在我的眼前飞舞。

还是那天，晚上在金寨县古碑镇一个黑猪养殖场用地用餐，文友相聚，其乐融融，几杯家酿的米酒下肚，全都原形毕露，谈文说艺，高谈阔论，兴之所至，还吟诗作赋。大家起哄要我献诗，脑子一热，潜意识中对创作的渴望和坚定流露出来，一段顺口溜脱口而出，其中有一句是“写不成书我是猪”。这句玩笑话当然也没什么风险，因为我本来就是属猪，万一写不成书，猪就猪吧。

现在回想，就是那晚，那件预感要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列宁小学和希望小学给了我一个巨大的灵感，那座一直矗立在我思维世界中的大别山，不仅是一座革命山、英雄山，它还是一座文化山、教育山，也是一座理想山、希望山。

从故乡回来后，我决定暂缓《飘呀飘起来》的构思，从根本处出发，首先写写这两所学校，写写这两所学校的孩子们，写写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些人们。为什么又是大别山？为什么大别山人民在革命战争和建设一再承担、牺牲、奉献？因为文化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希望的力量。此后两年，我又重新捧起被我翻阅过几十遍的《皖西革命史（1919-1949）》《金寨红军史》等资料，一张洋溢着红色理想的《鄂豫皖苏区建设规划图》被我放大了挂在书房墙上，沈泽民、蒋光慈、许慎慎、林月琴等大别山区早期革命者的形象一直活跃在我眼前，他们被我塑造成了作品中的红军崇山支队司令员韦思源和教官李桐、叶震霞、胡桃等人物，在他们引导下，一群山里的穷孩子捧起了书本，唱起了《列宁小学校歌》《读书歌》《童子团歌》。

在新的构思里，我写了拉倒（韩子路）、

秋子（乔咏秋）、白儿扎、姚菊等少年红军的故事。他们之所以能够克服贫困，拥有读书的条件并健康成长，有几个重要前提，一是因为他们有幸参加了革命，遇上了韦思源等有知识、有理想、有远见的革命者。即便是在反“围剿”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韦思源也坚持让他们避开血腥的战斗场面。韦思源有一句很温暖的话：“就算崇山支队全部牺牲了，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崇山支队打光了，还可以重建，而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孩子们长大了，可以建设中国。”这番话不仅是红军官兵的理想，也是我本人的理想。第二个前提是，李桐、黄奎、张树等红军官兵身先士卒的牺牲精神，极大地感染了孩子们的心灵，让他们很早就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树立了崇高的理想，知道应该为谁学习、为谁战斗。三是孩子们的自我教育，帮助他们发育出健全的人格。在由戏班子集体整编的红军宣传队里，拉倒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孤儿。白儿扎是旧戏班子的学徒、秋子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地下工作者的后代，这些孩子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小小年纪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

较之此前创作的军事题材作品，《琴声飞过旷野》拥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在两年多的准备时间里，我翻阅了很多资料，了解到红军初创时期，许多领导人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甚至有留学经历。基层官兵中，也有不少人读过私塾和公立学校，特别是后来有了列宁小学、造成小学、随营学校等教育机构，更是为部队提供了文化保障。每当我打开电脑显示屏的时候，往往就会看见大别山一隅，层峦叠翠的山谷里，明媚阳光下孩子们矫健的身影。他们既学军事，也学艺术；既学社会科学，也学自然科学；既学传统文化，也接受外来文化。基于对历史的认知，我在设计作品框架时，心中始终保有文化的底色，并弥漫在字里行间——学唱《国际歌》、讲世界革命故事、朱瑞丽老师传授艺术常识、秋子讲解理化基础知识……凡此种种，让孩子们视野掠过大别山，掠过正在搏杀的战场，看到中国和中国以外的地方，看到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景象……

在飘荡着浪漫气息的文化氛围里，小英雄战士们茁壮成长——拉倒成为红军宣传队队员后，以一颗淳朴的心灵领悟艺术真谛，以超常的勤奋弥补了天赋不足，成为宣传队里的一名琴手，并在对敌斗争中以



徐贵祥

郭红松绘

音符传递紧急密码情报，用艺术为大别山抗战贡献了一份特殊力量。乔咏秋是作品中的“理科男”，热衷于发明，他的理想是抗战胜利后回到大别山造水库，并在战争间隙积累了很多水文资料。在最后一场战斗中，他以艺术的敏感，破译了拉倒用琴声传输的情报，保证了部队里应外合。白儿扎在乔咏秋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最早进入战斗部队，成为一名少年指挥员，并在战争结束后以大别山水利师师长的身份、水利专家乔咏秋铺路搭桥，在举世瞩目的潘水水利工程建设中建立了汗马功劳……

我把这部作品命名为《琴声飞过旷野》。完工之后的某一天，我坐在自家阳台上，“眺望”两千里外的大别山，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明媚的阳光下，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的广场上，正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位年过八旬的老红军女战士精神矍铄，娓娓道来——

孩子们，你们总是问我，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啊，后来的故事可多了，后来我们又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解放军几万人马，开到大别山，组建水利师。我们宣传队也解散了，多数人都到水利师负责管理和技术工作，我们回到了月亮湾，回到了燕子河，找到了当年帮我们渡难关的王竹大娘和秋叶大姐，找到了当年失散的战友……我们和几十万大别山人民一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上洋结合，艰苦奋斗，终于，我们建成了……建成了……孩子们，你们看啊，那里——

老红军伸手一指，群山之间，白云之下，巍峨的佛子岭水库大坝横空出世。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

历史还原与精神描摹

——评丁晓平《红船启航》

纳张元

反映建党题材的报告文学不容易出新出彩，一是故事耳熟能详，难以发挥；二是人物众多，难以描摹；三是主题宏大，且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难以腾挪想象。军旅作家丁晓平的高报告文学《红船启航》（浙江教育出版社），钩沉稽考，发微抉隐，将百年前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史实，清晰而生动地还原给读者。他抽丝剥茧，觅迹寻踪，把“红船精神”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作了浮雕式的刻画与呈现，于是就有了这本好读又耐读的《红船启航》。

《红船启航》远远下笔，娓娓道来，开篇没有直接写中共一大召开，而是从1919年9月的上海落笔——“秋老虎”肆虐的时节，王会悟来到上海投奔茅盾。这是个小说式的开头，很出人意料，但细细品味却发现，作者不是故作惊人语。王会悟是茅盾的表妹，她到上海是来找茅盾的。她被带到老渔阳里2号，见到了“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并成了陈独秀家的常客。王会悟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其中就包括刚从日本归来的青年李达，后来两人喜结良缘。李达是一大代表，代表们在上海报到时，入住的“招待所”博文女校就是王会悟利用自己工作便利安排的，她还负责代表们的后勤保障。当会议中途需要紧急转移时，王会悟建议去她老家嘉兴的南湖，并亲自打前站，做了租船等准备工作；代表们在南湖游船上继续开会时，王会悟坐在船头放哨，成为“一大卫士”。像线穿珍珠般，她串起了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毛泽东等历史人物。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王会悟，并将她作为切入点和贯穿全书的线索，是丁晓平的慧眼独具和匠心独运。通过这个人，作者前钩后连，一直写到20世纪50年代末建立南湖革命纪念馆，那时王会悟还在发挥重要作用。

在对史料的钩沉和稽考上，丁晓平下了一番大功夫。《红船启航》上卷既展现了建党前风起云涌的中国时局和波涛汹涌的社会思潮，又细腻人物还原成鲜活的人物形象。刚出狱的陈独秀在1919年农历大年三十抵达成都上海时，哪些人接站、住哪里，他是怎样带病坚持工作，怎样用《新青年》搅动时局、唤醒民众；身在长沙的毛泽东怎样利用《湘江评论》声援陈独秀，传播革命思想；李大钊如何开展“问题”与“主义”之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是如何专注入迷，以至于粽子蘸着墨汁吃，还说很甜……至于一大召开的曲折经历，更是鲜活细腻、生动翔实，极大增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真实性。《红船启航》还将《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等刊物发表的重要文章有机融入叙事中，并做了大量专业和细致的注释，给当下读者提供了原汁原味的历史信息。因此，《红船启航》不仅是一部报告文学，更像是一部学术专著，以强烈的思想性吸引着我们。

《红船启航》下卷“精神聚入心”系统讲述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发展、红船的仿制过程，记录下嘉兴人民保护利用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红船精神的感人故事。为了追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现场，一代代嘉兴人做出了艰苦的努力。1958年春天，由郭竹林具体负责，开始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嘉兴人一丝不苟，为了求证当年开会乘坐的船型，他们查阅档案、走访当事人、请教老船工、召开座谈会、求助周边城市并两赴北京。得知纪念馆建设遇到困难时，中学生于群芳的5元捐款所引发的“我为南湖增光”热潮，更是令人动容。书中，作者首次披露了郭竹林、萧海根、于金良、章水强等为代表的嘉兴人民为复原红船和建设三代南湖革命纪念馆所做的努力，凸显了红船不仅具有文物史的意义，更有革命史的价值——它是一种精神象征，映照和指引今天的我们砥砺前行。

在《红船启航》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红色血脉的赓续，看到了红船精神的延传，更从开天辟地到共同富裕的百年历史风云中看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看到了从觉醒年代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

（作者系大理大学文学院院长）



◎新作评介

挖掘蕴于生活的历史感

任志峰

巴尔扎克曾说，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就应该总结这些民族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应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近读王法艇的诗集《芝麻开花的隐喻》（中国言实出版社），让我想起了这段话。

诗歌是以“点”的极简形式，从一个局部、一个侧面来反映世界，传达精神。但这些“点”，不是无根的孤立个体，而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环节，是逝去时空形象的记忆留存。这就要求诗人能由点及线，点中有面，面中留史，从总体把握和表现历史意识，将历史意识灌注于一个个意象，让字里行间散发出穿越时空的文字光泽——这即是作者所传达和读者所意会的历史感。

“芝麻开花，芝麻开花/母亲和大地一起，默念真经”“芝麻和母亲结拜姐妹/和母亲携手缭绕炊烟”“芝麻开口唱歌/它的歌曲只有升调/只有卷舌音才有婉转”，于是“母亲在村口迎接芝麻开花的歌声”。这是被用于诗集名的诗歌《芝麻开花的隐喻》中的诗句，该诗独辟蹊径，用一种植物勾连起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芝麻在贫瘠的土地上努力生长，绽放出令人心醉的花朵，象征祖国的繁荣与梦想，

丰收与希望。通过个人经历和民族意识去感知、体验历史，是王法艇诗歌创作的特色。

诗集《芝麻开花的隐喻》多是政治抒情诗，立意恢宏、意象纷呈，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其中的《春天，万物在阳光下纯粹》《七月，从闪电中淬炼出更璀璨的光芒》《和一株向日葵并肩眺望河山》《梦想的唱针转动中国》等作品，传达出浓重的历史感。德国诗人让·保尔有个更为细腻和精致的说法：“史诗叙述历史，抒情诗感觉和体验历史，史诗表现从过去发展起来的实践，抒情诗表现现在的感觉。”王法艇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一意境一意蕴”的情理结构，通过典型意象的连缀，汲取诗歌传统中的精华，以细腻笔触调用绵密意象，绘制出一幅精彩的历史画卷。

《一朵花撑开了中国》聚焦“一线轻颺的春风里/一朵花撑开了中国”的诗意，描摹冬去春来之际，天地之间辞旧迎新的面貌，诸如冒出新芽的柳枝、灵巧婉转的鸟鸣以及春色里风尘仆仆的行人。春日花开隐喻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这些朝气蓬勃的意象亦是历史大变局的象征。《和一株向日葵并肩眺望河山》巧妙地选择“向日葵”作为观礼祖



国大好河山的视角，跌宕起伏的山河、拔节生长的庄稼、成群疾飞的雨燕，这些美好的景致都在诉说着新时代的中国的庄严巍峨与绚丽多彩。《王家坝：每一寸坝体都是祖国的坚强》围绕“一座大坝蓄满一段历史的养分”就是一个民族蓬勃昂扬的主旨，体现王家坝抗洪抢险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从一朵浪花看历史长河的奔流，由一草枯荣观社会兴衰的变迁，可以说，王法艇的这部诗集较好地展现了诗歌“以点见面”的独特魅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优秀的史诗总是要表现现在的，并通过当代把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通过承载着中华民族革命史的纪念日，诗人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和感受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历史的因素。在“八月”，他说：“八月催苇，我想起流火南昌的色泽/如深秋夕下收敛的古松/在一城雷暴的酝酿

中/撬开光明的人”“此时，我的祖国和母亲/是那样殷勤可亲，舞姿优雅/祥和的阳光纷纷扬扬。”且看“十月”里的吟咏，“从十月开始，中国就进入创作期/她需要一部史诗祭奠翱翔的精灵/她需要小小的虫子吟咏，细雨合唱/她需要寓言和种子，传播无数的爱”。在历史的观照下，现实深化了。像多面晶体一样有了立体感，显得浑厚凝重。

历史感与现实感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历史感从现实出发，又回到现实。当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诗人以“束发，白衣，护目，和凌厉的风一起/在逼仄的空间里闷闷”“每一个战士都有侧身仰望的灵魂”礼赞逆行者。“战士/从名词升华为动词/骄傲翔舞，顽强搏击”“人民功臣的勋章在盛世绽放光华/祥和的世间有节奏叩响礼赞”……诗人走出书斋，用一片赤诚之心在诗歌里记录重大社会历史现实，挖掘蕴于生活的历史感。

“一个名词的内涵穿过故土/旧山河山，在深红的景深里漫延/洒落的血和火星，最终成为碑文”，这饱含情感的诗句说明，“情”不仅是诗歌的生命，也是历史感的血肉。历史感如地层深处的潜流，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只有对历史命运的关切之“情”来推动和传达，这种抽象的东西才能显化、具体化，使人意会领悟。

历史感是衡量一个诗人敏锐性和洞察力的内在尺度。在当今诗坛，王法艇诗歌中所呈现的“历史感”，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值得我们注意、思考和研究。

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

马光夏

袁晓君的《大陈岛的孩子》（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是儿童文学长篇小说里比较罕见的一部以垦荒为题材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小主人公黄晓洋在老垦荒队员、他的爷爷奶奶陪伴下，到当年闻名全国的垦荒地大陈岛参观的故事。他们在路上偶遇祖籍大陈岛的陈爱国爷爷和他的孙女陈莉莉以及前来接应他们的岛上民宿客栈的肖大海，小说以三个少年以及他们家人的过往人生和今昔变化，演绎出大陈岛大半个世纪的拼搏史与奋斗史。

在故事架构上，小说采用多条线索并行与交错发展的复合形式。一条线索是黄晓洋的上岛参观和他爷爷奶奶的垦荒经历；第二条线索是小女孩绽放光华/祥和的世间有节奏叩响礼赞……诗人走出书斋，用一片赤诚之心在诗歌里记录重大社会历史现实，挖掘蕴于生活的历史感。

“一个名词的内涵穿过故土/旧山河山，在深红的景深里漫延/洒落的血和火星，最终成为碑文”，这饱含情感的诗句说明，“情”不仅是诗歌的生命，也是历史感的血肉。历史感如地层深处的潜流，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只有对历史命运的关切之“情”来推动和传达，这种抽象的东西才能显化、具体化，使人意会领悟。

历史感是衡量一个诗人敏锐性和洞察力的内在尺度。在当今诗坛，王法艇诗歌中所呈现的“历史感”，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值得我们注意、思考和研究。

条线索几乎涵盖了大陈岛的全部历史，构成了一幅全景式风情画。特别是回来寻根的陈爱国和陈莉莉，他们的乡愁、经历以及目睹岛上变化后的感受，有力烘托了小说主题。

作者袁晓君力求故事情节丰满生动，目的是更好突出小说主题。写出几代人对“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的接续和传递。1956年至1960年，先后共五批467名青年志愿者奔赴大陈岛参与垦荒建设。今天，年轻一代面对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更不能丢掉老一辈的精神馈赠。作者特别写到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后代给爷爷写信的情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陈岛的孩子》的写作价值。

从艺术上看，《大陈岛的孩子》是一部有明显纪实性的小说，但作者将真实事件、真实历史背景与艺术虚构的人物处理得严丝合缝，浑然一体。比如大陈岛上的思归亭、垦荒纪念碑、甲午岩、垦荒雕塑等实景都十分准确具体，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比如张怡怡等小朋友，也是实打实的真名真姓。这样处理十分巧妙，既具有艺术想象的魅力，又令小读者有代入感。可以说，这部弘扬垦荒精神的作品，是开拓儿童文学新领域、新边界的一次有益尝试。

